

# 论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与机制

## ——基于1990年人口普查的分析

丁金宏

80年代,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快、规模大。同期关于中国城镇化问题的学术探讨也成为热点。然而,过去这类研究常常受到数据的限制,或因资料来源不同而纠缠于概念,或因统计口径相殊而各执己见。以致到目前为止,对于中国市、镇、乡“三层楼”中各装多少人、城镇化的人口“流量”构成、区域分异状况如何等重要问题,学术界仍未有清晰、一致的答案。

“四普”对人口的户口和住地类型有了详实的登记,并记录了1985~1990年间迁移人口的有关信息,为研究中国的人口城镇化问题提供了最可靠的资料。本文正是依据“四普10%抽样资料”<sup>①</sup>和对“四普1%抽样数据带”<sup>②</sup>直接交叉处理,研究当今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上述问题。

### 一 中国城镇化的口径、水平与省际差异

#### (一) 中国城乡人口的统计口径

城镇化的人口学意义就是人口向中心地的集聚和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化。长期以来,由于对这两类过程理解的侧重点不同,城镇人口的定义比较混乱,在统计和普查中客观上形成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叉的两种口径。

子、建材等五大产业,家用电器轻纺工业也发展较快。山东半岛的食品业和纺织工业也相当发达。

第三,主体是“面”而不是点。长江三角洲城镇圈的主体是上海,珠江三角洲的主体是广州,厦漳泉三角地区的主体是厦门,这种城镇辐射网络的中心是“点”。渤海城镇圈则不一样,因为环绕渤海沿岸是由许多城市组成的城市群,它们之间传统上有较密切的横向经济联系,但又各具有特点,各有自己的辐射面。

中国城镇化的另一种模式是自生型城镇化、非农化模式,这种模式是在城镇非产业功能不强、辐射力不大的基础上进行的,中西部城镇主要是这种模式。这里,我们以豫鄂川三省为个案来研究自生型城镇化。在这

三省中虽然也有一些像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但其经济辐射力不强。这种自生城镇化的特点是:第一,农村城镇化水平低,且农村工业化水平也低,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主要靠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而不是靠城市的辐射和扩散。

第二,虽然在城镇以外有大量的非农化,但这种非农化具有很大的传统性,经济效益低,产品质量差。

第三,这种城镇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靠城乡建制的改变来推进的城镇化。在城镇化的三大因素(自然增长、机械增长、城乡再划分)中,城乡再划分在城镇化中起着相对重要的作用。

(本文责任编辑:汪正鸣)

(作者工作单位:武汉大学人口研究所)

<sup>①</sup> 见“参考文献”(1)。

<sup>②</sup> 见“参考文献”(2)。

### 1. $n-a$ 口径

$n-a$ 口径是一种户口制,即按户口类型,将人口划分为非农业人口( $n$ )和农业人口( $a$ )。这是解放以来中国一直使用的人口登记管理制度。由于实际操作中有章可循,口径一贯(只在80年代中期扩充了“集镇自理口粮户口”),形成了可靠的40年系列资料。这是反映中国解放以来城镇化历程的最连续、最重要的数据。

这一口径强调了城镇人口从事职业的非农业性,淡化了城镇人口地域分布上的集中性和连续性,使分散在乡村或小集镇上的部分实际从事非农业活动的人口享受了城镇人口待遇。

根据“四普10%抽样资料”,1990年年中中国非农业人口数为21 985万人,占总人口的19.43%,其中3 231万人(2.90%)散布在市镇以外的“县”人口中。

另据统计资料,1989年年底,中国非农业人口数为23 051万人,占中国总人口的20.89%,反而比半年后的普查数多出1 000余万人,比重高出1.5个百分点。这个误差数中近一半是因为本次普查没有把450多万城镇“自理口粮户口”登记为非农业人口,而误差数的另一半有待探明。

当然, $n-a$ 口径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有时非农业户口并不完全是字面上所表达的职业性质,而只是表示一种资格。即拥有这种户口的居民,可以享有在城镇中生活或比照城镇待遇享受计划供应的权利。所以非农业户口习惯上也称“吃商品粮户口”。在实际管理操作中,一个人及其子女能否成为非农业人口,往往既不取决于他(她)是否已经在城市中居住,也不取决于他(她)是否已从事非农业经济活动,而主要是看他(她)是否符合“农转非”政策或满足非农业户口的“遗传”条件。许多已经在城市居住并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居民由于没有取得非农业人口的“资格”,仍然被定义为农业人口。因此, $n-a$ 口径往往不能全面反映城镇化的真实水平,也不适应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工作。

### 2. $U-R$ 口径

$U-R$ 口径是一种住地登记制,即按常住地类型,将人口划分为市镇(地区)人口( $U$ )和乡村(地区)人口( $R$ )。第一、三、四次人口普查中均采用了这一口径。“四普”规定:

市人口:设区的市所辖的区人口和不设区的市所辖的街道人口;

镇人口:不设区的市所辖镇的居委会人口和县辖镇的居委会人口。

因此,所谓市镇人口就是上述区人口、街道人口和居委会人口之和。

1990年,中国市镇人口已达2.97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6.24%。其中,市人口比重为18.84%,镇人口比重为7.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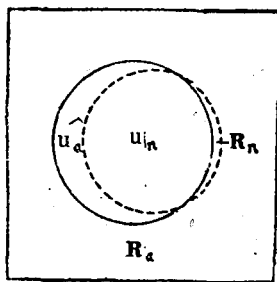
图1显示了1990年中国城镇化统计中两种口径的相互交错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城镇化水平除了可以用 $U$ 和 $n$ 来表示外,还可以有另外两种复合指标。

### 3. $Un$ 口径

即仅计算市、镇人口中的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是过分严格的城镇化指标。1964年人口普查时采用了这一标准,当年的城镇人口比重( $Un$ )为14.10%;到1990年,这一比重也只增加到16.53%,26年间仅上升2.43个百分点。这并不能说明此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停滞不前,而是由于 $U$ 和 $n$ 的主要伸展方向不相吻合,从而造成它们的交集的增长相对缓慢。

### 4. $Ra$ 口径

即乡村农业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是相对宽松的城镇化指标。1990年, $Ra=29.14\%$ ,其中既包括常住市镇的人口,也包括居住在农村和非建制镇中的吃商品



$$\begin{aligned} u_a &= 9.71\% > u = 26.24\% \\ u_n &= 16.53\% > n = 19.43\% \\ R_n &= 2.90\% \\ R_a &= 70.86\% - \bar{R}_a = 29.14\% \end{aligned}$$

图中实线圈内为城镇人口 ( $U$ )，圈外为乡村人口 ( $R$ )；虚线圈内为非农业人口 ( $a$ )，圈外为农业人口 ( $n$ )，包括“其他”户种人口。各交叉部分： $U_n$ 为城镇非农业人口， $U_a$ 为城镇农业人口， $R_n$ 为乡村非农业人口， $R_a$ 为乡村农业人口（资料来源：见参考文献(1)）。

图1 1990年中国人口城乡结构及两种口径的交错关系

和居委会，才是现实意义上的城市 and 城镇。换句话说， $U-R$ 口径接近城镇作为一种高密度居民点的概念。

2.  $U-R$ 口径也反映了城镇人口的非农化特征。表面上看，这个口径似乎忽视了城乡人口的职业属性差异，然而居住地的分异在很大程度上也隐含了职业的区别。大量长期定居于城镇的农业人口实际上已不再从事农业劳动，他们是不能完全享有城镇待遇的非农业人口。即使在城市边缘区甚至部分郊区，许多所谓的“农村”实际上已经是“无地村”。那里的“农民”在他们自己创办的企业里就业，在城乡结合部兴建公寓，分享城市的基础设施。将他们作为城镇人口统计是不无道理的。

3. 具有一定的纵向可比性，对形成新的科学的城镇人口统计口径有重要意义。在历次人口普查中，对“市”、“镇”的界定颇不一致。即究竟把市镇作为一种居民点，还是作为一种行政区域。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犹疑不定，导致城镇化指标或肥或瘦、陡增陡减，缺乏可比性和权威性。1953年普查时，市的人口不包括郊区人口，市镇人口比重为13.10%，明显低于非农业人口比重。1964年普查规定的市镇人口更加严格，只计算其中的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14.10%，同样低于当年的非农业人口比重。1982年普查时界定的市镇人口是各市镇行政范围（不包括市辖县）的全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跃而至20.55%，高出当年的非农业人口比重3个百分点。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指标比较接近当时的实际城镇化水平，但是由于口径上的重大变动，不便类比，人口学者、城市学者往往欲言又止。

“四普”制定的城镇人口标准基本上是“三普”的延续，并且其内容设置更加细致，尤其是对县级市和镇，剔除了其中的乡村人口，使之拥有更良好的可信度和国际可比性。从图2可见，“一普”、“二普”的城镇化水平显著低于实际情况。“三普”、“四普”与非农业人口的位置关系相近，一个新的城镇化水平指标体系正在形成。

当然，采用  $U$  指标也有一些现实问题。首先是不便进行经常性统计，难以形成年度系列

粮人口 ( $R_n$ )。目前， $R_n$ 中的绝大多数人口相对集中于小集镇上，只是由于这些集镇尚未达到建制镇的标准，因而通常仍被作为乡村人口统计。而这类人口在集镇上的集聚规模，往往又是决定该镇能否建制的主要依据。因此可以说， $R_n$ 人口是未来人口城镇化的“种子”，是“准城镇人口”。可见  $\bar{R}_a$  也是一种颇具内涵的、能够表征未来趋势的、辅助的城镇化指标。

## (二) “四普”的人口城镇化指标评价

在  $n$ 、 $U$ 、 $U_n$ 、 $\bar{R}_a$  四个城镇化指标中， $U$  最切合人口集中化和非农化的统一标准，“四普”获得的城镇人口26.24%的比重指标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目前人口城镇化的真实水平。

1.  $U-R$ 口径强调了人口居住地的性质，实质上也就强调了城镇人口的空间集中性，因为只有接近工商业中心的、地域上连片的人口高密度社区才有可能被设置为(市)区、街道

资料。中国人口登记管理长期实行户口制度，对人口的住地统计并不严格，特别是在城市边缘地区，由于城乡交错、边界模糊，人口统计和管理还相当混乱，要进行一年一度的街道、居委会常住人口核算尚有困难。其次是直接受行政区划变动的影响，它所显示的城镇化趋势中难免掺杂着“城镇划”因素。 $U-R$ 口径所指的市和镇均是指已经政府批准的“建制市”和“建制镇”。尽管国家已在试行统一的设市、设镇标准，但各地掌握的尺度并不相同，以致出现“千人城市万人镇”的混乱现象。与“三普”相比，1990年中国建制市的个数增加了近1倍，建制镇更是上涨了两倍多。这固然有经济增长的客观需求和推动，但一些地方过分热衷于撤县建市、撤乡建镇或乡镇合并，也是造成市镇人口机械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本次普查中，对设区市、县级市和镇分别采用了区、街道和居委会作为“原子”区域，形成了镇人口偏紧，而设区市人口偏松的不平等状况。例如，上海市宝山区1990年人口62.3万人，按照规定全部登记为市人口，而实际上该区除了下属有6个街道和5个镇外，还管辖12个乡，195个村，乡村人口占了总人口的近一半。相反，四川省雅安地区所辖的16个建制镇中，有3个镇下面只各设一个居委会，有四个镇根本没有居委会，其中的三个镇甚至没有居民组，所以按居委会统计的镇人口显著偏少。当然，对于镇人口与其说是口径过紧，毋宁说是行政建制残缺。这不是普查本身的问题，但是客观上导致的镇人口统计上的不完整却不容忽视。有鉴于此，建议在今后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中更进一步地划小设区市的“原子”区域，所有的“市人口”都统一为“街道人口”。同时健全镇的居委会建制，使市人口和镇人口有更强的可比性。

### （三）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省际差异

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省际差异很大，可以分为六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三个直辖市，城镇化水平均在65%以上。1990年底，三个城市的市区非农业人口分别为：北京557.0万人，天津457.5万人，上海749.7万人，是中国城镇体系中的三大“巨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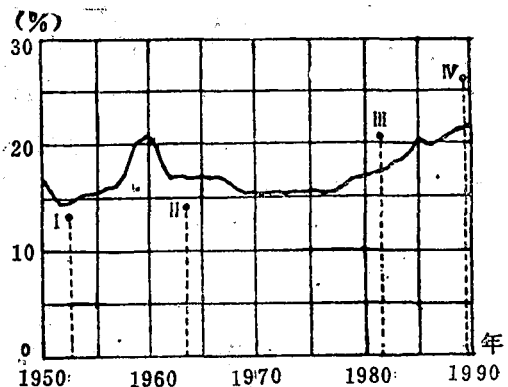
第二层次是东北三省，城镇化水平在40%以上。东北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大城市密集。全国31个非农业人口超百万的特大城市有8个在东北。其中沈阳市人口规模为380万人，紧随天津市，为中国第四大城市。全国28个规模在50~100万人之间的大城市，东北就占了10个之多。

第三层次为广东、内蒙、新疆、浙江等省区，城镇人口比重在30%以上，属于中上水平。

第四层次为湖北、宁夏、山东、山西、青海等省区，城镇化水平在25%以上，属于中等水平。

第五层次为福建、江苏、江西、甘肃、陕西、海南、贵州等省区，城镇化水平在20~25%之间，属于中下水平。

第六层次为四川、西藏、河北、安徽、湖南、广西、河南、云南等省区，城镇化水平在



资料来源：见“参考文献”（5）、（6）。

图2 1950~1990年中国非农业人口比重水平演变及其与历次人口普查时城镇人口比重的对比

20%以下,其中云南省只有14.74%,仅相当于北京市的1/5。

中国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差异,除了东北地区偏高而西南地区偏低外,其它区域没有更多的宏观的地带性或地域性规律可循,因此我们只能就事论事。

1. 经济发展格局是城镇化水平省际差异的主要背景。图3标明了中国各省城镇化水平( $U$ )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G$ )的坐标位置,粗略的线性相关关系为:

$$U=0.01347G+7.43$$

$$\text{相关系数 } r=0.3709$$

相对而言,城镇水平较高的省市区之间的 $G \sim U$ 线性关系更为确实,而城镇化水平低于25%的大多数省区的 $G \sim U$ 坐标则“抱作一团”。

2. 对比1982年普查时的城镇化指标及位次,广东、湖北、山东、西藏等省区城镇化水平的增长显著。特别突出的是广东省,8年中城镇化水平上升一倍多,排名由原来的第十七位一跃而至第七位。这与该省80年代的经济飞跃紧密相关。1981年,广东省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列全国第十四位,而到1990年已升至第五位。

3. 河南、贵州、江西、福建、陕西等省区的城镇发展比较缓慢,相对位次显著下滑。

4. 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大多是近年来的人口迁入省,而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则绝大多数是人口迁出省。1990年城镇化水平排在前17位的省市区中,除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浙江四省区1985~1990年间人口净迁入外,其余各省市区均为净迁入;而排在第十七位以后的13个省区中只有海南省人口净迁入,其它省区全部是人口净迁出。这表明城镇化与人口相互迁移激励,互为“马太效应”。

## 二 城镇化的流量分析

城镇化是一种现代文明过程,因此不仅要考虑其存量(城镇化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考虑其流量。所谓流量就是人口由农村向城镇的推进速度及其构成。

(一) 1985~1990年间就地转化人口规模的测算

由于行政区划变动,农村人口未经迁移而直接成为城镇居民的过程称为转化,这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形式。然而,对于中国人口转化的规模及其对城镇化的贡献问题,学界鲜有正面探讨。

根据“四普1%抽样数据带”的原始数据,笔者提取了1985年住地为乡而1990年变为镇和市①的人口记录,并按迁移与否进行分类,按抽样比推求了未统计为迁移而由乡进市镇的人口共计2345.23万人,其中进市598.61万人,进镇1746.62万人。但这三个数字还不完全是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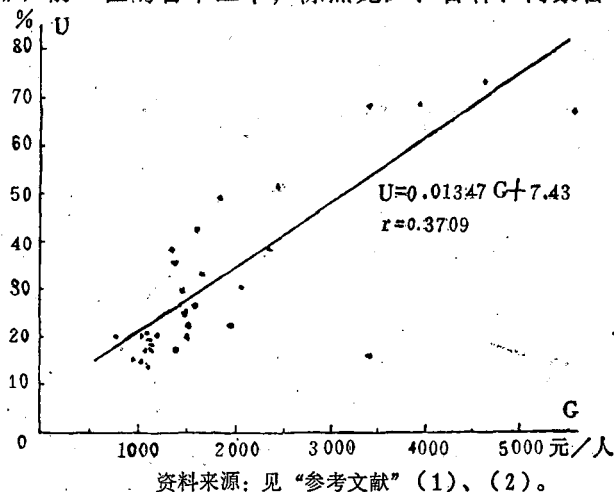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各省城镇化水平( $U$ )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G$ )的相关关系

① 为明确起见,本文中的“市”、“镇”专指1990年人口普查时的“市镇人口”统计区(即城镇);而“市域”、“市县”之“市”均指市的行政区域(不含市辖县)。

人口数, 因为本次普查定义的迁移是跨县市的常住地变更, 无法直接反映县市内由乡到镇或由乡到市迁移的人口。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笔者尝试采用年龄结构拟合法。

以入市人口为例。

定义: (1) 未计入迁移而由乡入市的人口为 $Q$ , 其归一化年龄结构为(5岁以上, 5岁为一组, 下同):  $X_q = (x_{q5} \ x_{q10} \ x_{q15} \cdots x_{q35+})^T$

(2) 实际就地转化入市的人口为 $T$ , 其相应的年龄结构为:

$$X_t = (x_{t5} \ x_{t10} \ x_{t15} \cdots x_{t35+})^T$$

(3) 市域内由乡迁入市的人口为 $M$ , 其年龄结构为:

$$X_m = (x_{m5} \ x_{m10} \ x_{m15} \cdots x_{m35+})^T$$

(4) 县人口为 $R$ , 其年龄结构为:

$$X_r = (x_{r5} \ x_{r10} \ x_{r15} \cdots x_{r35+})^T$$

(5) 省内跨县市由乡迁入市的人口定义为 $O$ , 其年龄结构为:

$$X_o = (x_{o5} \ x_{o10} \ x_{o15} \cdots x_{o35+})^T$$

由于转化人口是因行政区划变动而成为市人口的, 所以可视为一种被动城镇化过程。因此这种转化对人口的年龄结构没有特殊选择性, 并且这些转化者与其原来所在县人口的年龄

结构一致; 对于市域内由乡迁入市的人口, 我们设定其对年龄结构的选择性与省

内跨县市由乡迁入市的人口相同, 即假定:

$$X_t = X_r$$

$$X_m = X_o$$

图4表示了 $X_r$ 与 $X_o$ 的差异,  $X_o$ 中15~29岁人口的比重远高于 $X_r$ , 而其他年龄组的比重则低于 $X_r$ ;  $X_q$ 基本位于 $X_r$ 与 $X_o$ 之间, 是两者的混合。

因此, 当 $Q$ 中实际转化人口所占比重为 $\alpha$ 时, 当有:

$$\alpha X_t + (1-\alpha) X_m =$$

$$\alpha X_r + (1-\alpha) X_o = X_q$$

成立。

当然, 精确相等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求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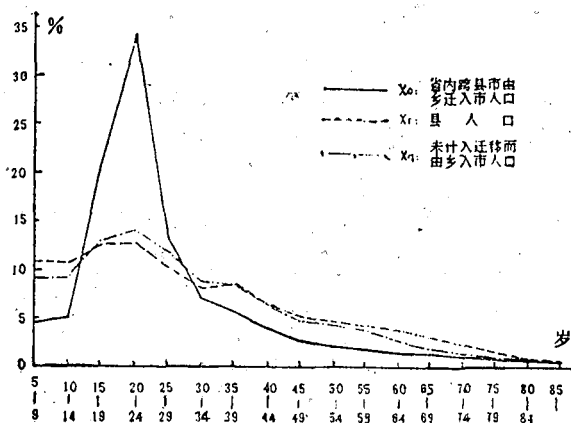
$$\sigma = \sqrt{\sum [\alpha X_{ri} + (1-\alpha) X_{oi} - X_{qi}]^2 / n}$$

趋于最小 $\alpha$ , 其结果为:  $\alpha = 79.2\%$   $\sigma_{min} = 0.0075$

这就是说, 按照概率估计, 未计入迁移而由乡入市的598.61万人口中, 市域内迁移入市的人口为124.52万人, 而就地转化人口为474.10万人。

同法估测出镇人口的  $\alpha = 88.6\%$   $\sigma_{min} = 0.0070$

即未计入迁移而由乡入镇的1746.62万人中, 迁移入镇的人口为199.11万人, 而就地转化的人口为1547.51万人。



资料来源: 据“参考文献”(2)整理。

图4 迁移与非迁移人口的年龄分布对比

因此我们说, 1985~1990年间, 中国实际由农村人口就地转入城镇的人口数为 2 021.61 万人, 其中转市者 474.10 万人, 只占 23.5%; 而转镇者达 1 547.51 万人, 占 76.5%。

### (二) 1985~1990年间中国人口城镇化的流量构成特征

在上述数据的基础上; 结合“四普” 10% 抽样资料, 可以得出中国人口城镇化流量构成的基本特征。

1. 1985~1990年间中国人口城镇化的总规模为 3 566.88 万人, 平均每年约有 713 万农民成为城镇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总基数相比, 年均城镇化率在 8.5% 以上, 相当于同期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一半强, 这是空前的高速度。

2. 转化的贡献大于迁移。在 3 566.88 万城镇化人口中, 转入城镇者有 2 021.61 万人, 占 56.7%; 迁入城镇者有 1 545.27 万人, 占 43.3%。这说明, 在中国现阶段, 由农村进入城镇的农民, 多数是因行政区域的变动而“被动”城镇化的; 而变更居住地的“主动”城镇化处于次要地位。

3. 由乡到市的人口城镇化以迁移形式为主体。在由乡到市的 1 657.07 万人口中, 迁移人口为 1 182.97 万人, 占了 71.4%; 而就地转化者只占 28.6%, 说明进入城市的乡村人口大多数是具有相当“能量”的主动迁移者。

4. 由乡到镇的人口城镇化以转化占优势。在由乡到镇的 1 909.81 万人口中, 转化人口为 1 527.51 万人, 占 81.0%。这主要是建制镇数量增加(乡改镇)的结果。而真正“离土又离乡”的迁入人口只有 362.30 万人, 占 19.0%。

5. 由乡到市的人口迁移以省内跨县市迁移为主。在由乡迁入市的 1 182.97 万人中, 省内跨县市迁移人口为 781.99 万人, 占了 66.1%; 省外迁移居其次, 占 23.4%; 县市内迁移最少, 只占 10.5%。

6. 由乡到镇的人口迁移以县市内迁移为主, 其次为省内跨县市迁移, 省外迁移最少, 三者所占比例分别为 55.0%、32.4% 和 12.6%。这说明向镇的人口迁移的平均空间尺度要比向市的迁移小得多。

7. 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的差距是城镇化的弱负因子。1985~1990年中国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般要比农村地区低 4~5 个千分点, 5 年中由这一差别抵消的城镇化水平估计有 0.5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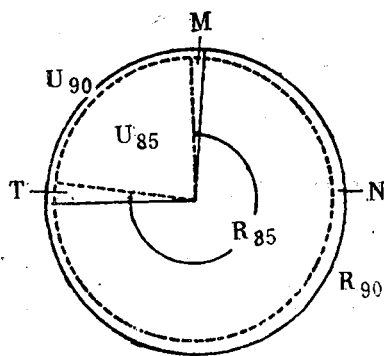
在转化、迁移和自然增长的共同作用下, 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可表示为图 5 的模式。

### (三) 市、镇、县之间的人口对流

根据 1% 人口抽样资料, 中国市、镇、县之间的跨县(市)对流具有以下特征:

1. 人口迁移的绝对量以乡到市的迁移为最多, 其次为乡到乡的迁移。

2. 乡流入市与市流入乡之间的对流量之比为 10:1。镇流入市与市流入镇的迁移流量之比为 2.6:1; 乡流入镇与镇流入乡之比为 2.5



T 为乡村转入城镇的人口, 城镇化的首要因子;  
M 为乡村迁入城镇的人口, 城镇化的第二因子;  
N 为偏重于农村的自然增长人口, 城镇化的弱负因子。  
 $U_{85}/R_{85}$  为 1985 年的城镇/农村人口比重;  
 $U_{90}/R_{90}$  为 1990 年的城镇/农村人口比重。

图 5 1985~1990 年中国人口城镇化过程的三因子构成

1. 乡、镇和市犹如单向导通的三级管, 人口不断向高一级的聚落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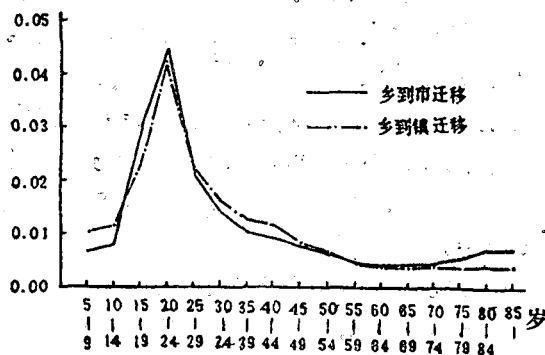
3. 以迁出地人口为分母计算的迁移率(即迁出率), 以镇流入市为最高, 反映了镇在中国城镇化中的过渡性或人口不稳定性。市流入市居第二位, 说明城市之间的人口对流趋于活跃。

4. 跨省的迁移人口中, 市流入市的年均迁移率达1.97%, 超过镇到市的流动, 成为主流。

#### (四) 迁移城镇化人口的内在特征

1. 男性比女性的迁移活性大。迁移人口的平均性别比为126.7, 显著高于全国人口的平均水平。由城市返回农村的迁移人口的性别比高达335.9, 市返迁入镇的人口性别比也高达230.4。这说明与城镇化过程相逆的扩散人口主要是有必要这样做的男人。但乡村间的迁移人口以女性居多, 可能的原因是婚姻迁移在其中的份量较大。

2. 乡到市镇的人口迁移率的高峰年龄段为15~34岁, 最高峰为20~24岁。仿照人口生育模式, 我们求得1985~1990年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总和迁移率(TMR)为0.1407, 其中由乡到市的TMR为0.0973, 由乡到镇的TMR为0.0434(均为省内跨县市迁移)。可以说相当于按1985~1990年平均的迁移率水平, 一个农民一生中在省内迁移到城镇的可能性约为14%。用各年龄组的迁移率与TMR相比可以得到由农村向城镇迁移的年龄模式(见图6)。可以看出, 乡流入市与乡流入镇的迁移模式大体相似, 但亦有所不同。乡流入市在15~24岁段的峰态更高些, 且在75岁之后又有明显提高; 相比之下, 乡流入镇的模式分布比较单调, 25~54岁年龄段在迁移率下滑较为平缓, 该段模式线高于前者。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2)整理。

图6 省内跨县市由乡至市镇的人口的  
年龄别迁移模式

3. 务工经商是迁移城镇化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学习培训, 再次是家属随迁。但分别而言, 乡到市与乡到镇的迁移原因分布有明显差别, 在乡到市的迁移人口中, 投亲靠友的人口超过随迁家属; 而在乡到镇的迁移人口中, 随迁家属的比重占18.6%, 不仅多于投亲靠友人口, 而且超过了学习培训人口。由于没登记县市内迁移, 所以女性人口占主导的婚姻迁移位次偏后。

####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2. 《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1%抽样记录》(磁带),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1991。
3. 丁金宏:《论胶东半岛人口分布、迁移与转化》(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 1989。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编:《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1991年度), 群众出版社, 1992。
5. 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1。
6.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8),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8。
7. 丁金宏:《雅安地区人口城镇化对策》, 见伍理, 丁金宏等人所写《四川省雅安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研究》(研究报告),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 1992。
8.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1。

(本文责任编辑: 王跃生)

(作者工作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